

渔村掇客引潮流 ——略论香山买办文化对近代化的建树

王 杰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唐人崔颢《题沈隐侯八咏楼》的诗句，不禁勾起笔者对买办这一特殊阶层的无限慨叹！

未入正文，先述“引子”。

记得两年前在中山召开“华侨文化与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学人提问：开平（恩平）与香山，同是侨乡，又是芳邻，都建碉楼。两者相比，前者显见规模雄伟、建筑呈群、工艺更精细，这是为什么？我的答词是，探究其表里，两者“本质”之区别，在于文化内涵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草根文化心理与精英文化心理的取向不同。“草根”文化心理“表”于虚荣的“浮躁”，因为自己先前的社会地位低下，今朝既已发迹，便刻意在世人面前“妆”门面，摆阔气，抖威风，示显赫；“精英”文化心理则不然，他们的思考更理性，目光更高远，取向更趋深邃，尤其在文化意象上内化其归宿。再者，“草根”注重眼前，立足个体；“精英”即放目未来，注重服务群体与报效社会。会后，笔者一直在思考着“精英”文化的走向，寻找其共性的涵质。如果把香山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香山的华侨如是，而香山的买办更甚然。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的功业与影响，其表征呈横空出世，振聋发聩；中西兼容的文化内涵，独步一时。他们以“躬身”的姿态，着先鞭于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与之同步，又以“表率”的风貌融中西文化于一炉，在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充当急先锋。

横空出世 重置士农工商排位

历史的本身即是过程。“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其中的事事物物都带有过渡性，都充满着新旧质素的纷争与消长。”^[1]在中西方交流的初级阶段，产生了一种“过渡性”的中介人——买办。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国门破开，欧美商人蜂拥东来，开辟中国商机。这一时期，中西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买办也随之增多，并逐渐形成一个在经济收入日渐显赫的群体。

香山扼珠江出海口，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开放的文化氛围为买办的诞生准备了历史的土壤。明中期葡萄牙人租据澳门，以及清初广州一口通商，乃至鸦片战争后英国割占香港，这都为广东尤其是香山大量“出产”买办提供了天时与地利的“温床”。

“近水楼台先得月”，香山买办凭毗邻港澳之先机，沐浴了欧风美雨的“浸润”，借“洋泾浜”英语的洗礼，捷足登上了中西商贸的前沿。上海开埠通商伊始，香山买办占据了先到和先手的便宜，在与外贸和商业经营有关的洋行、商号、钱庄等洋场“抢占”了先机和“制高点”。宝顺、怡和、琼记、太古等著名洋行的买办，大多来自香山客。^[2]“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上海有财有势的广东买办有徐宝亭、林清（阿康，Acum）、郑观应、唐景星和唐茂枝兄弟，都是香山人。”^[3]香山的唐（廷枢、廷植）氏、郑（观应、翼之）氏、徐（钰亭、润）氏、莫（仕扬）氏等几大家族逐渐成为买办世家。

西方的“坚船利炮”仗势袭来，孱弱的清政府节节惨败、割地赔款，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巨大反差，震撼着沉迷于“大邦”美梦和“孤芳自赏”的先觉者。买办就是中介于中外商贸过程中的“先觉”群体。中国人从不缺乏吸纳和学习的精神，“先觉者”初始以为，西国胜在“利器”，故欲

[1] 章开沅：《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序》，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王杰：《绝代百载 风骚一时——论说香山买办与买办文化》，载《岭南文化》2007年第3期。

[3] [美] 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制敌，先治其器。于是，率先引进西方器械和技术建设军工业，合资（或独资）创办民用业的热潮应时而起。在创办西式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重用熟悉西方商业文明的人才。独具经营和资金优势的买办因此被引入洋务运动，参与了大多数近代企业的创办，如轮船运输业、电信电报业、矿业及纺织业等四大类民用企业。铁路、金融、银行、机器、码头、垦殖、保险、盐务、煤气、印刷等新式行业也随之创建，同时培养了一批新型技术人才。买办的影响力开始从经济层面向社会政治层面转移。这种转变，对提高买办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无疑具有“碑记”意义。

香山买办的“先觉”，表现在他们开风气之先。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从中西贸易的实践中体悟了“工业化”的真谛，内化了“商战”的理念，因而成为清末民初“工商立（救）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在与西方商人长期交往中，感悟到“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提出“习兵战不如商战”思想，主张发展工商业。在清政府创办的新式企业资金不足和经营不善的时候，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引进西方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尝试中西结合，实践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创造，在制度创建和管理上体现了“西体中用”的趣旨，逐渐将西方的股份制、保险机制、竞争机制、核算机制纳入洋务企业的管理，走出企业商办、民主管理、培养实用人才、多元化经营的路子，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积累了经验，摸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模式。徐润还慧眼独到，在呼吁“振兴商务”以追赶欧美的同时，强调为使“我之利不使外溢”，宜急培养自己的人才，积极支持清政府派幼童赴美留学，升华强国富民之术。

唐廷枢、徐润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充当了先驱的角色。1873年，唐廷枢、徐润受李鸿章委派接办轮船招商总局任总办和会办。唐、徐一经接手，就扩大资本，推出合股投资体制，实行股份转让，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使招商总局的股值一年之内翻了一倍半，开中国股市之先河。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招商总局不仅拥有了长江和沿海航运的大部分市场，还拓展了南洋运输业务，于菲律宾、泰国设立分局，开辟远航英国、日本、新加坡、

[1]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4页。

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业务。轮船招商总局除了承运漕粮，还延揽商货，与太古和旗昌等洋行争利。1877年，轮船招商总局吞并了当时轮船运输业的老大——美国旗昌轮船，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1883年，唐廷枢奉命赴英国考察，为北洋舰队订购船只。经元善曾说：“唐、徐声望素著，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1]

1876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开采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招集资本到煤矿开采，他都亲力亲为。经由唐氏之积极筹划，煤矿产量大幅度攀升，并带动了铁路和水路运输的发展。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建立了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开平铁路和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至19世纪80年代末，开平煤矿已占据天津整个市场，为矿务局的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78年6月，上海《远东月报》撰文赞许：唐氏“破除旧时锢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2]1892年10月，唐廷枢辞世，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盖此公一生精力消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3]上海《北华捷报》载文称誉，唐氏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困难的”。^[4]

徐润投资传统茶业和新兴房地产业，财富迅速聚集。1868年，宝顺洋行停歇后，徐润结束了买办生涯，成为民族资本家。他开设“宝源祥茶栈”，在河口、宁州、沔溪、江西九江、湖北洋楼洞、崇阳、湖南湘潭长寿街等处设立茶号，以茶栈带茶号，既担任买卖的中介，又自行投资贩运，自成购销系统。宝源祥茶栈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上海最大的经营茶叶出口的茶栈。徐润还在上海茶叶公所、丝业公所、洋药局、仁济医院（上海第一家

[1]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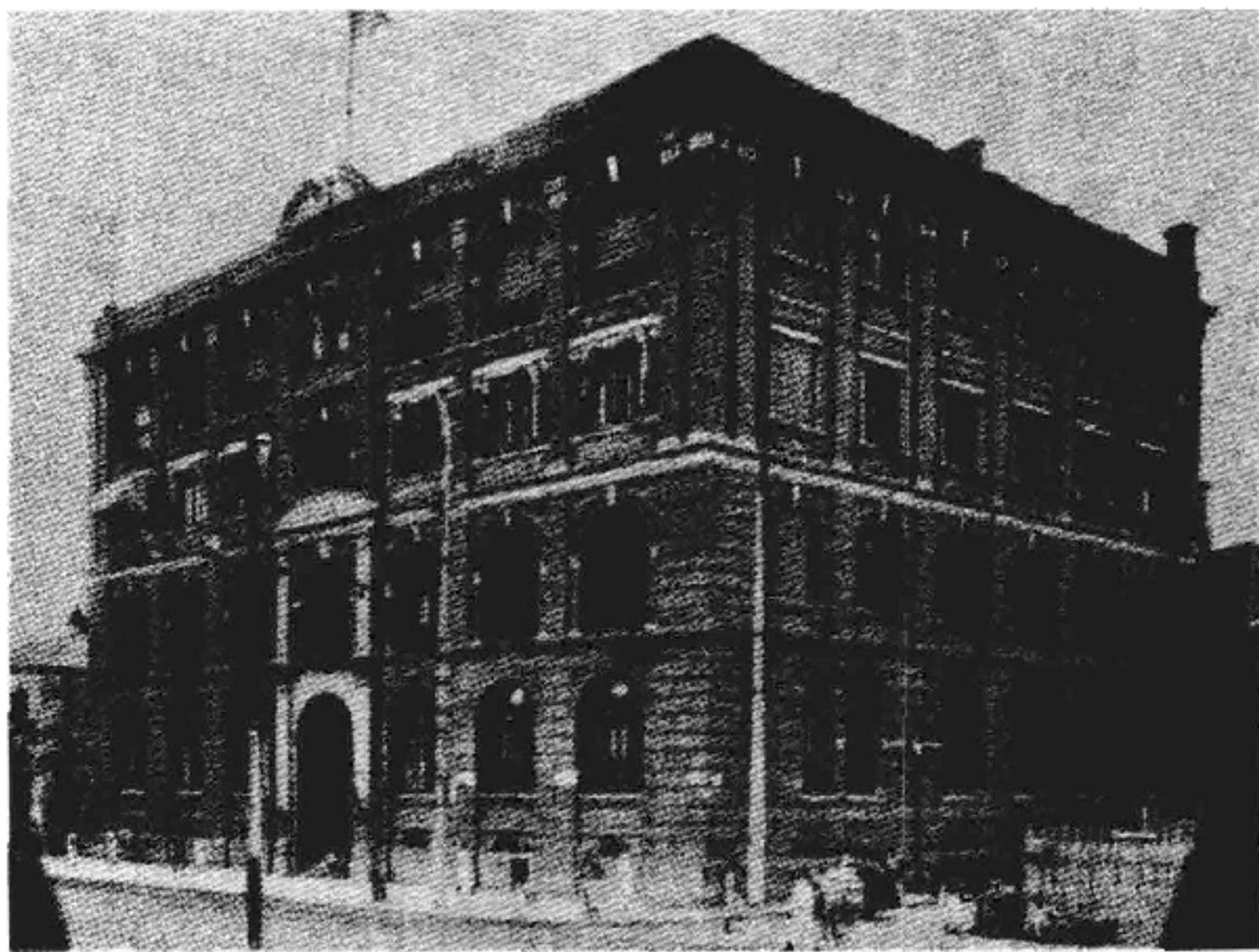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八），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9页。

[3]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

[4] 《北华捷报》1892年10月14日，第562页。

医院)、格致书院任董事,创办同文书局。19世纪70年代,列强竞相在上海开设租界,各地富豪纷纷来沪开办工商业。徐润洞察上海百业振兴,万商云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先购地3000亩,建筑楼宇320亩,造洋房50所,楼房、平房、临街馆房等2000余间,年收租金12万余两,成为风云一时的地产商。个人资产达341万两,其中房产占223万两,股票投资82万两,典当、钱庄等34万余两,一时富甲上海滩。

郑观应的“商战”理论,既源自洋行买办的经验,更得益于创办近代企业、与外人“商战”的感悟。1878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委郑氏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离开太古,受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难以维持的轮船招商总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在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经内外治理,轮船招商总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总局总办。1891年3



上海太古洋行大楼

月，郑观应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次年李鸿章再度委其为招商总局帮办。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总局十条》，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总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1896年，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兼任粤汉铁路总董，5月，由轮船招商总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1899年10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如是复杂的商旅的历练，反过来又为郑氏的商战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香山买办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新式企业的创办与建设，被学人誉为19世纪颇具影响力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1]

香山买办不仅在19世纪的沿江海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开平等投资现代民族工商业，还激励和推动了故乡的工商业开发。在两广总督张人骏和时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的郑观应的支持下，香洲开埠可谓是一大创举。^[2]用现代的话语说，乃是在一个荒沙滩上建设一个商业开发区。《香洲商埠详细章程》第一章开宗明义阐明其旨：“欧美以商务立国，以卫生殖民，此文化所以日进也。我国欲救贫弱，输入文明，当从商场、住场起点。况当此外界之风潮激刺，内地之水旱颠连，因以垦荒殖民，振兴商务，讲求土货，挽回利权，使我伟大帝国四百兆同胞绰然雄立于地球，以共享文明之幸福。此垦辟商埠之宗旨也。”^[3]

为国争利权——这一心声与呐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的最强音，在《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的条文中可以找到佐证。《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明示了极具爱国情怀的措词，曰：“此收条乃系华人所用，如有外国人拾得及将此条转卖与外国人者，本埠一概作为废纸，特此声明”。^[4]这既是民族气节的宣誓，也是文化底蕴的张扬！

《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4月23日（宣统元年三月初四日）4版《本报特

[1] 汪敬虞：《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香洲与澳门相近，本为一片沙滩地，因位于香山场与九洲之间，故各取其名中一字，起名“香洲”。

[3] 据《香洲商埠详细章程》影印件（陈树荣先生赠）。

[4] 据《广东香洲商埠挂号收条》影印件（陈树荣先生赠）。

电》载有关于“香洲开埠”之报道。该电文不算长，为还原当时态貌，兹全文照录于下：

昨初三早七句余钟，海通顺利两轮船，载港商约二千人，往澳门东北二十余里，吉大乡北之野狸湾，行开埠礼。本馆代表员亦与焉。埠命名香洲，由港启行，经急水门，过伶仃洋，西向，程期约三句钟久。至时已有羊城兵轮，共九艘，分泊左右。粤督张、水提李，皆在座船内。又有澳门拱北关之龙晴、金星两缉私轮，泊于野狸洲前。羊城商界乘大兴轮船到者，澳商乘小轮至者，亦数百人，诸轮俱泊湾前海面。另有小轮三四艘，渡客泊岸，登竹桥，有大道长数十丈，直达行礼棚。道上竖牌，横分东西，马路四，兵队雁列两行，棚大可容千余人，悬额七八方，一曰“强国之基”，是宁阳商界所赠送者；一曰“利国利民”，是香港商界所赠送者；一曰“骏业宏开”，是公益埠商界所赠送者，余亦皆颂祝开埠之语。中设香案，案后设炕桌。时乡绅拱候者，为叶舜琴、曾兆荣、杨应奎、容兆端、梁乔与卢汉墀等。香山县城绅士，则有黄桂丹、何鼎元、廖庆炎、邓鼎、刘鸿宾、林毓华等。地方官到者，香山县凌、县丞杨、前山厅庄、前山守备向等。约一句钟炮响连击，粤督张、水提李、劝业道陈，相率登岸，直至棚口，□下与入。众官绅引粤督至炕前略座，随即引至香案前，行三叩礼毕。随员乃出颂辞三通，一是张督者，一是李水提者，一是陈劝业道者。时有一不知姓名之西装华人，手执颂词，背张督而宣读，读声虽高，而句读上下牵连。

时见李水提立其身后，含哂不已。闻张督之颂辞，无非利民兴国，李水提之颂辞，无非安民保商，劝业道之颂词，无非振兴商务。宣读毕，乃接读绅商答辞，仍背向粤督众官等。又读毕，其人竟欲自行演说数语。后有人以为时无多，船开在即，又不欲久劳宪驾，亟阻止之。惜不知其将如何发言，想必别有一种解围之言论也。

本港报会中书记，初请其将宣读之颂词，给予抄录。惟彼既给后，又复夺还，诚不知其是何居心。及张督辞退时，将两句钟矣。是日崇朝大雨，到后犹淋漓不断，午间略放晴光，海平如镜，诸人登岸行礼时，东北风陡作，棚内结彩飏飏作响，海上波浪冲击。少顷大雨倾盆，衣履

尽湿，返至港已钟鸣六句半矣。是日开会主席为伍于政。其礼节共分十种：一开会，二行礼，三兴工，四宣布，五祝词答词，六演说，七军乐，八闭会，九茶会，十军乐。按此湾南向水颇深可泊巨舰，野狸洲半抱其右。惟左，则微嫌其开露。闻诸开埠绅商云，将以地价为筑坝之资，俾成一环抱之港。按直道之左平圻最宽阔，已划出街道，条条似井，屋地分一百四十段，道之右亦平坦，屋地分二十八段，共可建铺屋二三千间。拟每间取地价三百元，既筑坝后则开马路，直达前山，长约二十里，将来所到香洲之货皆免税，运入内地者，则照例征取云。

次日“广东新闻”还载有“张督对于香洲新埠之政见”：

张督亲往该埠举行奠基礼，闻对于开埠各事以办理缉捕、设置巡警、扩张利权、振兴实业四事为尤注重，并探察该埠沿海一带形势险要所有照料夫马各事，悉由善后局派员前往预备云。

上述引文显见，香洲开埠盛况空前。两广总督张仁骏、广东水师开埠提督李准、粤府劝业道陈望曾和省港澳及县城嘉宾出席开埠仪式。会后，众人选王诜等5人为“商埠总办”，王诜为埠主。这也是该县最早的商会组织，隶属县商会。

开埠后，王诜继续集资10万银元，招引侨商巨贾，经两年多的开荒拓土，填壑筑路10条，建成大小铺户1000多间，其中两层楼房125座，“香洲酒店”等企业崛起埠中，班航与移民日增，洋人亦来修筑教堂，市场日旺。奈何宣统二年（1910）七月，一间白铁铺突然失火，连续烧了六个小时，致厂店及八百间屋烧毁殆尽，几千灾民流离他乡，商埠一下成了废墟。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组成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体系中长期处于末流位置的工商业者异军突起，特别是这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洋行买办，他们在与外国商人的交易过程中，比对中西方文化，感悟西方文明的优长，寻找中西之间的差距，主动为缩短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架桥铺路。他们通过躬身的实践与总结，中体西用经世致用互为升华，逐渐成长为知识商人群体中的新生力量。相对而言，他们比一般的读书人更有切身体会、切肤之痛，更具忧患意识。新生的买办知识群体，不仅着眼于与外人“商战”争利，更察觉政治制度上的落后，并为

政治的变革大声疾呼。在思想态度上，他们从忧患转为奋起；在社会地位上，他们从边缘人步入社会的主角；他们异军突起而引领潮流的特殊建树，令正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刮目相看。因之，从社会观念上，潜移默化地颠覆了传统“士农工商”的排序。在中国近代史上，买办群体的崛起，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谓空前绝后。

中体西用 兼容东西文化冲突

香山买办乃是因中西文化最早碰撞而衍生的“土特产”。作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者，在谋生与从商的探索中，“自觉”兼容外来文化、无形升华本土文化，并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升华自己——从经济买办步入文化买办层次，承担起引导与表率作用。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或许不是初衷。因之，在很大程度上说，他们身后所引发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的影响，或许也是始料不及的。

不同“质”的文明并不因质“异”而相斥，它们需在一定的碰撞的过程中互为吐故纳新。

香山买办的成长与事功，说明两种不同“质”的地域文化相遇，对立与冲突并非是单一、绝对的，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文化的构建，是一个内外整合的系统工程。某一系统欲保持其旺盛生命力，不仅需要各成员单位的齐备，还需要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同外界其他系统之间保持一种持续的互动。文化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和误读，从长时间来看，必将是两种文化间的磨合与融汇。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最终走向兼容并包，排污不排除，优胜劣汰，从而升华本土文化、塑制新的本土文化。香山买办（文化）于一百多年前经已自觉为中国和世界当了先锋，做出了典范，将之称为买办文化，或许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

香山立百粤之南端。梁启超说：“吾粤僻处岭南，与中原邈隔，故在数千年历史上观之，其影响于国家政局者不甚大。虽然，以世界的眼光观之，吾粤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也。”^[1]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伊始，西

[1] 梁启超：《莅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24页。

学首先以“商”为“桥”，通过澳门这一“桥头堡”，开始与中华文化交汇，催生出“中西合璧”的香山文化。而作为中西商务（文化）交流中介人的买办，先“游刃”于此。历经300多年的融汇，及至19世纪以降，香山被中外誉为“买办故乡”。一种包容、创新、敢为人先、底蕴深厚的买办文化诞生于香山一邑，并由此辐射神州大地。

香山买办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买办阶层中的佼佼者，在于它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及其影响巨大。香山唐（廷枢）氏、徐（润）氏、郑（观应）氏、莫（仕扬）氏四大家族，对西方商业知识、生活习俗比较熟络，又粗通西语，乃至与西商的人际关系，因之香山人具有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1]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香山人几乎在与外贸和商业有关的洋行、商号、钱庄等行业占据了有利地位，宝顺、怡和、琼记、太古等洋行的买办，都以香山人为主。他们具有四个特点，即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会中西，植根中华。这是香山文化的集中反映。^[2]香山买办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既利用外国人的信任，又凭借与本土的人脉关系，从事买办和私营商业，成为近代中外贸易、洋务运动时期商业文化建设的先驱者和创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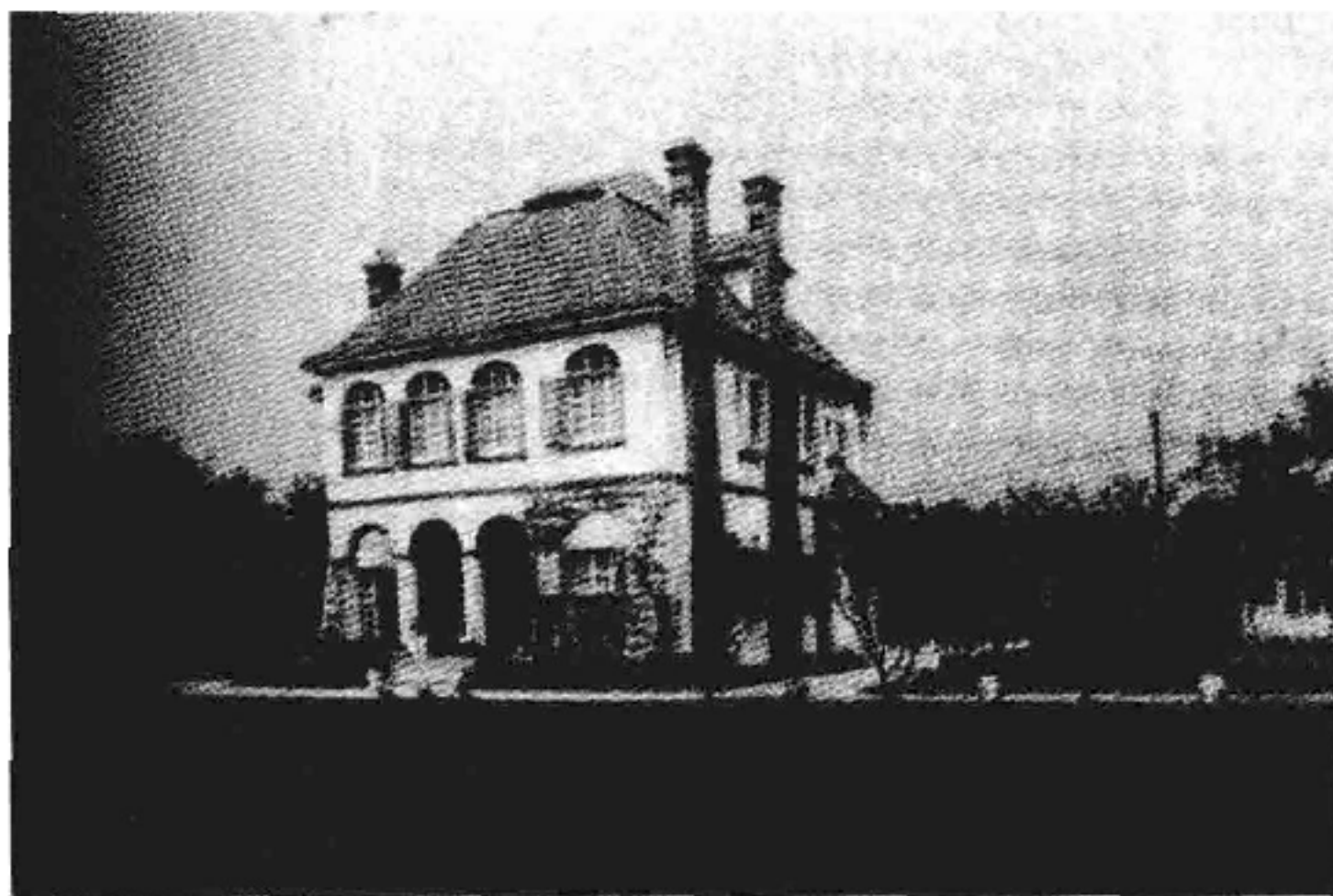
香山买办群体既是商业上的买办，也是文化上的“买办”。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体验中，凸显出“中西合璧”的韵味：既时尚又不远离传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又不割舍中华文化根脉，留守华夏文明；他们以半中半西的特征“言与行俱”，为时人展示中西兼容的时尚价值观和文化观，令时人趋之若鹜。

在居住方面，买办讲究“半中半洋”。他们建造房子，“没有外国建筑师可供利用，图样由外国侨商自行绘制，又为适合就地取材和中国技术而由中国营造商加以修改……”^[3]或者修建中国传统建筑风味的园林和住宅，室

[1] 叶显恩：《香山文化与买办商人》，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2] 熊月之：《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307页。

[3] [美] 罗兹·墨非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在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页。



上海一位买办的住宅（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提供）

内摆设着东西方各式家具。

在服饰方面，他们是最早西装革履的中国人，间或“蓝绸长袍和剃过的头上戴一顶绷紧紧的瓜皮帽”。

半中半西的文化心理，在郑观应的诗里表现得活灵活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与《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两诗集虽然基本同名，主旨却大异其趣。前者言入世之志，阐发“治国平天下”之道；后者言出世之志，抒发修行炼仙之道。前者忧国忧民，悲天悯人；后者超然物外，吟仙咏道。《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体现的是一个情感炽热的爱国诗人的形象，而《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却是一个热衷于道教的信徒。然而，两本诗集分工明确，几乎互不干扰，使我们很容易区分世俗的郑观应和宗教的郑观应，不致混淆。说到底，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在郑观应的思想中终归是统一的，即先救世，后求仙；先度人，后度己。郑氏追求世俗的圆满和追求道教信仰的圆满最后得到矛盾的统一。^[1]

在信仰和社会生活方面，他们既受儒学、佛教和行会等传统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但又别出心裁地俯瞰仿效西式时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兼

[1]方志钦：《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第149页。

容守常和趋新，使他们成为当时最西方化颇有影响的中国人。^[1]买办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群体，在许多方面都逸出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为闭塞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实践“洋为中用”，香山买办可谓故事多多：不仅学习和传扬西方商业文明，而且将西方的现代技术嫁接于中华文明。1873年，在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香山买办和香山籍官员叶廷眷等的支持下，容闳创办了《汇报》，^[2]翻刻中外新闻。1875年，徐润引进外国先进印刷设备和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他在北京宝文斋觅得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和《资治通鉴》等书，陆续加以拓印。所印书籍中，规模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书局乃首创预约订购的办法，因此而名声大振。同文书局所印书籍，字迹清朗，装帧精美，颇受社会好评，被学界称为“同文本”。民国《上海县志》记徐润有关贡献：

“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在运用西方印刷技术传扬中华文明方面，徐润不是第一人，其地位却举足轻重。

就语言来说，他们不少人毕业于教会学校，或曾留洋，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多能熟操英语，或“洋泾浜”。但是大多数国人在日渐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还是受制于语言关。“因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以及“贸易最大莫如英美两国，而别国人到来亦无不晓英语，是与外国人交易，总以英语通行”。^[3]唐廷枢编撰的《英语集全》，采用粤语注音，“分门别类，订缪指讹，莫不条分缕析，至吹舌音、卷舌音……尤发前人所未发，诚为习英语者之津

[1] 参见[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2] 黄晓东、刘中国：《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26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3] 《英语集全·唐廷枢自序》，转引郭秀文编著：《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132页。